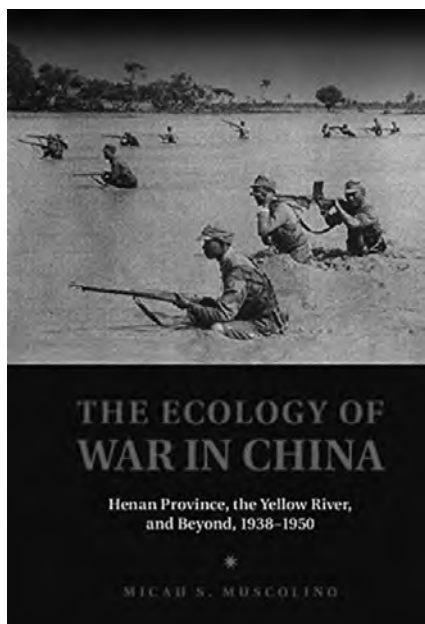


國殤？河殤？

——評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 侯曉佳

穆盛博在《戰爭生態學》中細緻分析了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和日軍就黃河據點展開的博弈、戰爭環境下生態的畸變，以及河南人民面對戰爭和生態災難時艱難求生的歷史；從能量和能量流動的角度，深入詮釋了戰爭、洪水和饑荒相互影響的關係。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一 引言

自古以來，戰爭與環境變遷左右着人類的命運。隨着環境學的興

盛，愈來愈多學者注意到二者的緊密聯繫，但在中國史領域，相關研究成果寥寥。譬如，近十年來中外學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研究成果豐碩，卻甚少觸及二戰與中國生態環境的關係^①。事實上，大自然在這場戰爭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尤其典型的是1938年「花園口決堤事件」導致黃河改道，河南、江蘇、安徽等下游省份連年遭災，其中以1942至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為最。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現任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目光精準地以戰時河南為例，在新著《中國的戰爭生態學：1938-1950年的河南、黃河及其他》(*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以下簡稱《戰爭生態學》，引用只註頁碼)中細緻分析了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和日軍三方就黃河據點展開的博弈、戰爭環境下生態的畸變，以及河南人民面對戰爭和生態災難時艱難求生的歷史。

穆氏引入「社會代謝」(social metabolism) 的概念，把戰爭、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視為一個有機體，從能量和能量流動的角度，深入詮釋了戰爭、洪水和饑荒相互影響的關係。簡而言之，戰爭消耗大量能源，而洪水本身亦包含巨大的能量，治理洪水因此消耗龐大。參戰各方必須在戰局和防洪之間決定如何分配能源，如何利用洪水打擊對手，卻往往不以民生為首要考量，導致饑荒蔓延。為了求生，人們背井離鄉，或逃荒或開荒，卻又給生態環境帶來進一步壓力。然而，自然界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來回應人類的行為，往往帶來更嚴重的災難。

二 內容簡介

本書依據時間順序分為七個章節。第一章詳細敘述了花園口決堤事件及後續。1938年5月，日軍佔領徐州，即將沿着隴海鐵路和平漢鐵路直擊武漢。戰局緊急，黃河河務被國民黨軍事指揮官接管。恰逢夏季黃河水位高漲，國民黨軍隊炸開河南鄭州附近的花園口黃河大堤，以水代兵，期冀沖毀黃河南面的隴海鐵路，牽制日軍的機械化部隊。決堤的洪水從花園口向東南傾瀉，漫流過河南東部、安徽北部，流經江蘇入海。中日雙方遂以黃河新河道為界分庭抗禮數年。就軍事而言，這一行動暫時阻止了日軍的前進步伐，為國民黨遷都重慶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國民黨也得以保留新河道以西的鄭州、山西等地。但尾隨而至的洪災吞噬了至少八十萬

人的生命，淹沒良田無數，導致約四百萬人流離失所，然而這只是一系列災難的開始。

大部分讀者對花園口決堤事件並不陌生，少為人知的是該事件只是「以黃制敵」的開始(頁35)，中日雙方隨後一直在試圖利用黃河為軍事服務。黃河改道以後，國民黨軍隊佔領了新河道的西面，日軍佔領了東面。國民黨決定保留花園口缺口，在河道以西修築防洪堤，希望黃河向東漫流，堵塞隴海鐵路，「河防即國防，治河即衛國」(頁36)。而日軍為保證從新鄉到開封的鐵路暢通，也竭力阻止黃河重返故道，不惜襲擊花園口以擴大缺口。日本水利專家同日偽政權合作，在黃河東面築堤以阻止黃河東擴。中日雙方匆匆修築的堤壩東一塊、西一塊，缺乏詳細計劃，再加上黃河泥沙日積月累，極大地影響了黃河的正常流動。河水不斷衝破堤壩，始終沒有形成固定的新河道，數年間在華北平原上漫流，並留下泥沙一路。黃河洪水和泥沙沉積更破壞了途經的淮河及其諸多支流，極大地加重了淮河流域的水患。

本書第二章關注洪災難民的生存境況。花園口決堤後，很多當地人相信缺口很快會被修復，於是根據經驗搬到附近地勢較高的地方暫居。不幸的是，這場水患與戰爭交織，洪水來得遠比一般持久。1938年以後黃河年年泛濫，難民人數以百萬計(頁66)，眾多難民不得不離開河南，給所到之處帶來各種壓力。困於戰爭，國民政府提供的救濟相當有限。衛生條件的匱乏和人群的密集導致疾病橫生，難民境況極其淒慘。國民政府最初以鼓勵開荒和

「花園口決堤事件」是「以黃制敵」的開始，中日雙方隨後一直在試圖利用黃河為軍事服務。國民黨決定保留花園口缺口，希望黃河向東漫流。日軍則竭力阻止黃河重返故道，不惜襲擊花園口以擴大缺口。

天災導致減產，戰爭耗盡存糧，也阻礙了各地之間的糧食流通。河南省能量的輸出遠遠大於輸入，故此遭遇了一場大饑荒。它對國民黨也是一場軍事和政治災難。

重建家園為賑災手段，陝西省是河南難民的首要遷入地，其中陝北的黃龍山成為開荒首選。作者介紹了在國民政府幫助下，幾萬難民在黃龍山開荒數萬英畝田地的事迹。

常常為人忽略的是，戰爭也為災民提供了非常的生存之道。參軍成為最重要的謀生手段，其次是走私：國統區和日佔區的貿易封鎖為走私提供了市場，而走私為災民提供了生路。環境的鉅變也帶來了新的機會，比如，在黃河泥沙和洪水覆蓋下，黃泛區部分土地鹽化，而災民學會在鹽化地裏提煉私鹽，四處販賣。災民亦搜集災後殘存房屋的磚、瓦、木材等任何可利用的資源，自用或送到附近城市販賣。但由此產生的副作用是，本來已開伐過度的華北地區經過難民的徹底搜刮，生態情況變得更加嚴峻。

第三章直面1942至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這場河南歷史上最大的浩劫奪去了約150到200萬人的生命，數百萬人逃離家園。對於這場饑荒，現有研究主要強調戰爭等人為因素^②，穆氏則將戰爭、生態變化、食物生產及流通視為一體，多角度立體地分析饑荒的成因。

1938年以來反覆的黃河泛濫極大地破壞了河南的農業生態，難民外流造成勞動力缺乏。穆氏更指出全球性的厄爾尼諾現象給華北地區帶來持續的乾旱，國統區河南當年的收成只是平常年景的28%（頁93），連年戰爭更是雪上加霜。河南作為日軍和國民黨軍隊在華北相持的中心，需要為雙方提供巨額物資。國民政府為了應對超級通貨膨脹，改變了稅收結構，要求農民以實物納稅，把財政壓力轉嫁給農

民。而快捷便宜的鐵路多被國民黨佔用或破壞，糧食運輸費用常常超過糧食本身的價值，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為了保證軍需，國民黨常常強行徵用耕畜，進一步損害了農業生產。戰爭機器消耗了糧食、牲畜、人力，對於被天災所困的河南人民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擔。戰爭讓絕大部分家庭戶無餘糧。當災害發生，即使是富戶也難以維生，勿論貧苦人家。國民政府以軍情為重，依舊維持軍事攤派，賑災的決心和手段都大打折扣。天災導致減產，戰爭耗盡存糧，也阻礙了各地之間的糧食流通。在各種因素下，河南省能量的輸出遠遠大於輸入，故此遭遇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

而這場大饑荒對國民黨也是一場軍事和政治災難。兩年的饑荒嚴重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戰力。由於缺乏軍糧，國民黨軍隊只能向農民「借糧」，因此軍民關係極為緊張。受災民眾對國民黨多懷怨恨，因而給中國共產黨滲透華北提供了機會。中共通過規範和控制食物分配，實行預決算制度，完善了食品供應，並有意識地同當地居民合作，防止國民黨、日軍和偽軍搶糧，共產黨與河南居民的關係大為改善；加上黃泛區水深草茂，也有利於游擊隊作戰。無形中，河南大饑荒及災民的悲慘遭遇為共產黨後來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本書第四章緊扣主題，再次轉向描述水利和生態。在饑荒最嚴峻的1942和1943年，河南人民在死亡線上掙扎時，國民黨和日軍仍在利用黃河為軍事服務。穆氏引用大量地方數據，指出雙方以軍事防線為重，修堤導水，不惜改變黃河的

自然流程。同樣面對黃河，國民黨和日軍各自的問題卻略有不同。國民政府最大的困窘是財政匱乏，無力援助治水，各種自費營建的水利工程給當地居民帶來了沉重負擔，因而政府、軍方與河南居民就物資分配的矛盾進一步加深。調查研究發現，河南在水利上的花費超過其他的稅收和攤派，每年所消耗的人力十倍於軍事需要（頁134）。

東岸的日佔區情形更是複雜，日軍一方面面對共產黨游擊隊的不時干擾；另一方面需要協調日方專家和中方專家對水利工程的意見。穆氏的研究形象地再現了當年的「一地雞毛」，其中不乏黑色詼諧的時刻。比如，1942年，經過協調，共產黨游擊隊承諾保證修堤人員的安全，河南日偽政府從滿洲國調入水利工程師修築太康等河段。一開始工程進展順利，當時被認為是人力勝天的典範。但正當日偽政府準備大肆慶祝堤壩完工的時候，大雨傾盆而下，洪水衝破了堤壩，慶典資金迅即被用於救災。1942年底以後，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戰事不利，日本在華北的負責人不願再投入人力物力維修河堤。1943年，日偽政府的中國水利專家更投奔國統區。此後，日偽政府就鮮有維護黃河大堤的舉措，黃河情形日漸崩壞。

第五章再一次聚焦饑荒中的河南災民。饑荒導致災民流離失所，大量男丁加入軍隊或到縣城打工，老弱病殘婦幼多有留下來以乞討為生。以河南扶溝縣為例，1938年黃河改道之前人口約34萬，洪災後減少到17萬，1942至1943年饑荒後下降到12萬，到1945年人口進一步減少（頁144）。關於饑荒災

民的經歷，很多與第二章的描述相似，但本章更注重個人經歷。作者以二戰後對西華、扶溝縣近百個家庭的採訪記錄為材料，講述了許多催人淚下的中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在這裏無法一一道來）。此外，本章也更加關注婦女的苦況，在男丁離鄉後，她們被迫成為一家之主，要照顧老人小孩，養家餬口，成為農業主力。社會的失序並沒有給婦女帶來解放，而是帶來更深重的負擔和苦難。

河南大饑荒是一場生態災難。食品匱乏，饑民不得不以動植物為食糧，河南村莊不再聞雞鳴犬吠。饑荒帶來的移民潮更是移動的生態災難。難民走到哪裏，就剝那裏的樹皮為食，令樹木不久後枯死，木材則供災民取暖。如此，整個移民過程就是浩浩蕩蕩的去森林化。陝西省仍舊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當地政府並不歡迎移民。陝西居民對難民也不友好，對他們不乏歧視、謾罵，但難民還是以各種方式進入陝西，以同鄉組織為紐帶，艱辛求活。國民政府加大墾荒力度，安置難民。本章再次以黃龍山開荒為例，指出隨着難民的不斷湧入，開荒者的數量已經超過黃龍山能夠承載的限度。環境破壞愈來愈大，農作物減產，火災、疾病頻發，很多人最終放棄了開荒。戰前的黃龍山鬱鬱蔥蔥，戰後幾乎所有樹木都被砍伐殆盡。穆氏由此討論了難民與環境關係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第六章探討戰後河南的重建。八年戰爭、洪水和饑荒重創了河南的農業、水利和各種基本建設。上百萬災民離開河南，不計其數的牲畜死亡。戰爭結束後，重建河南所

同樣面對黃河，國民黨和日軍各自的問題卻略有不同。國民政府最大的困窘是財政匱乏，無力援助治水。日軍既要面對共產黨游擊隊的不時干擾；也要協調日方和中方水利專家的意見。

需的食品、勞力、物資都嚴重缺乏。幸運的是，跨國組織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聯總」) 提供了大量物資和重建家園的專業指導，也同國民政府的中國善後救濟委員會密切合作。二者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協助黃泛區的災後重建。

戰後大量災民因為河南物資的匱乏和水患的不確定性，起初拒絕返回河南家鄉居住。1946年，最初的黃河洪災區如扶溝、西華、太康等地，洪水已經基本乾涸，但淤泥覆蓋了良田，農業生態惡劣。最早的返鄉者沒有井水可以飲用，沒有房屋居住，沒有牲畜耕作，沒有市場交易，交通也很困難。因此要恢復河南的農業生態，首先要解決黃河泥沙沉積的問題。穆氏廣泛閱讀了當年的田野調查和科學報告，指出洪災區的土壤差異很大，不同地區沉積的泥沙是不同的，有的是淤泥，有的是沙，有的利於農業，有的不利，需要因地制宜慢慢處理，但當地居民缺乏能力，也缺乏資源來尋找最佳解決方案。而數年來泥沙的淤積使土質變硬，需要更多的勞力投入，這對於耕畜幾乎絕迹、農具短缺的河南又是一項考驗。由於缺乏農具和牲畜，很多農民根本無法耕作，只得依靠打魚、除草，或在洪災區尋找殘留的生態能源為生。當地居民從沉積的泥沙下挖出被淹沒房子的磚和木材，將這些原材料運送到附近城市販賣以維生，儘管河南本身急缺建築材料。

為了援助戰後重建，聯總進口了多台拖拉機，並建立拖拉機站幫助河南農民清理耕地。隨着拖拉機

的到來，難民也漸漸返回家鄉。但隨着難民的回遷，疾病又成為嚴重威脅。而最大的問題依然來自黃河，洪水的威脅如利劍時時懸在河南人民的頭頂。因此，黃河再次成為河南重建的焦點。

第七章關注二戰後黃河水利工程建設以及圍繞黃河據點展開的各種政治博弈。1946年，聯總開始計劃修復花園口缺口，同時挖引水渠迫使黃河重回故道。但中國國內軍事和政治形勢使工程變得政治化。是年，黃河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華北的分界線。中共控制了黃河北岸，包括黃河1938年改道前的河道，因此要求相應的糧食和資金補助，以重新安置已經在黃河故道安家的四十萬居民。黃河再一次成為國民黨打擊對手的軍事資源：國軍從政府處接手工程，1947年初，在沒有事先通知各方的情況下完成花園口堵口工程，迫使黃河重回故道，淹沒了五百多個村莊，十多萬人無家可歸 (頁203)。

堵口工程本身為河南災民提供了急需的工作和食糧，對河南農業帶來的好處也顯而易見。至1947年夏天，80%的原黃泛區成為耕田。黃河重歸故道後，河南人口增加，農業復蘇，戰略重要性凸顯，國共雙方對河南的爭奪也日趨激烈。隨着黃河的再次改道，國共之間的天堽屏障愈來愈窄。1947年，雙方在河南開始短兵相接，小規模戰鬥爆發，雙方開始向當地徵糧、徵兵。共產黨稅收本來就低於國民黨，而黃泛區大量的無主土地和混亂的土地使用權極大地便利了共產黨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吸引難民加入；國民黨與農民的關係則愈來

1946年，黃河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華北的分界線。黃河再一次成為國民黨打擊對手的軍事資源：國軍從政府處接手工程，1947年初，在沒有事先通知各方的情況下完成花園口堵口工程，迫使黃河重回故道。

愈緊張，很多當地居民轉向支持共產黨。

1949年，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到1950年代，河南黃泛區的人口已經恢復，西華、扶溝等地的糧食產量超過戰前，但河南的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黃河留下的淤泥質地不同，深度不同，需要制訂不同的耕作策略。每到冬天和春天，新沉積土容易受風患。黃河淤泥也堵塞了淮河的支流，沖毀了數百公里的堤壩，使該地生態脆弱。治理淮河和建立大面積的防風帶將成為共產黨日後艱巨的工程，其影響一直持續到1958年的大躍進。至此，戰爭中河南的故事告一段落，新的篇章將在紅星照耀下展開，當然這已超出本書的討論範圍。

三 本書評價

以上簡述了《戰爭生態學》各章節主要內容，因本文篇幅所限，略過了大量精彩細節。二戰期間黃泛區的歷史、河南大饑荒、黃龍山開荒都不是環境史的新課題，中國環境史研究者馬立博 (Robert B. Marks) 在大作《中國環境史：從史前到現代》(*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中已有提及，但僅短短兩頁輕輕帶過^③。作者把這些課題綜合起來，從能量和能量流動着眼，從而把戰爭、人類社會和生態環境看作一個有機體來分析，則是本書的獨到之處。

作為歷史學家，穆氏對材料的掌握可謂翹楚。他充分利用了台灣國史館檔案、中央研究院檔案、中國河南和陝西等省檔案、鄭州市檔

案、黃河水利委員會檔案、聯合國檔案和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檔案，還廣泛參閱了民國時期的出版物和1980年代以來中英文有關研究資料。穆氏使用的資料並不局限於歷史人文範疇，他還參考了很多自然科學的研究，比如第三章引用1940年代對黃泛區土壤的研究、最新的全球氣候分析等。本書信息量龐大，作者在史料上花的功夫令人驚嘆，幾乎每一章都有意外之喜：或是新論點，或是新材料，或是新故事，非常值得一讀。

本書字裏行間充滿了對災荒環境中河南人民的悲憫之情，他們面對暴力的國家政權和嚴苛的自然環境，幾乎是無力反抗，不得不拋棄家園，輾轉求生。但這種人文關懷並沒有影響作者的批判性，他更沒有簡單地把自然災害視為罪魁禍首。一方面，僅僅從人類的角度來評價自然災害未免太過狹隘，穆氏指出，黃泛區雖不再是人類的理想家園，卻成為動物的樂園，對早已過度開伐的華北生態來說是一種休養生息；另一方面，他也屢次強調，難民為生存所迫，他們的逃荒、開荒都對自然環境帶來巨大的傷害，千里荒蕪。人與自然的辯證關係正是環境史最核心的命題，種種爭論最終化為一聲嘆息。

然而，作者在細節處理和分析上還有可待商榷之處。比如，第六和第七章都着眼戰後恢復，在材料和敘述上重疊頗多（如對聯總的報告分析和背景敘述），可以考慮兩章合併成一章。各章節內有些事例和論點也多有重複，閱讀起來不大順暢。此外，本書強調能量和能量

穆盛博使用的資料並不局限於歷史人文範疇，他還參考了很多自然科學的研究，比如1940年代對黃泛區土壤的研究、最新的全球氣候分析等。本書信息量龐大，幾乎每一章都有新論點或新材料。

從政治、軍事角度探討國民黨、日軍及共產黨幾大政治勢力針對黃河的博弈是本書的一大亮點。穆盛博對國民政府的研究最深入，對中共的研究則顯得單薄。書中涉及中共的部分多利用中共官方材料，如工作報告等，致使批判性不強。

流動，那麼各種統計數字就顯得很重要。書中對幾個重災縣份如扶溝、西華等地方數據翔實臚列，但全域性的數字卻相對模糊，比如河南總人口在1938到1947年間各年的變化；每年黃河水患的傷亡和財產損失統計等，都有所缺失。對此，中共黨史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叢書」應該有所助益^④。

從政治、軍事角度探討國民黨、日軍及共產黨幾大政治勢力針對黃河的博弈是本書的一大亮點。穆氏對國民政府的研究最深入，對中共的研究則顯得單薄。比如，第三章比較國共雙方應對河南大饑荒的異同，強調中共利用預決算制度保證了糧食供應，並改善了與當地居民的關係（頁116），但對這個制度如何運行，中共原有的關係網和糧食供應如何操作，語焉不詳，比較空泛，時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書中涉及中共的部分多利用中共官方材料，如工作報告等，致使批判性不強。

本書強調新陳代謝、能量流動，這是一個有消耗也有產出的過程，但穆氏的分析強調戰爭消耗能量，那麼戰爭產生的能量如新科技又對環境有甚麼影響？戰爭產生的「排泄物」又有哪些，各有甚麼作用？近年來軍事環境史異軍突起，成為環境史重要的研究領域，而本書的主題「戰爭和饑荒中的河南」可以說是軍事環境史的典型案例。現有理論強調環境和戰爭的互動，強調戰爭帶來更多的征服自然的技術和戰爭中建立的獨特商品鏈^⑤，那麼河南的事例如何與這些理論相呼應？

戰爭生態學中一個重要的爭論是戰爭對生態的影響是持久還是相對短暫的。本書第七章指出河南

受災地區很快就重建了農業生態系統，農業生產也迅速恢復如初，因此證明了戰爭對環境的影響，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都相對不持久（頁234-35）。但也有學者指出「由於戰爭造成的環境破壞和生態系統內的生存競爭往往會在戰爭結束後以更為劇烈的方式呈現出來」^⑥，如果我們把技術革新和戰爭帶來的心態變化也算作戰爭的一部分，那麼本書結語部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河南地區水利政策的簡述，似乎更證明了戰爭帶來的影響是長久的（頁242-46）。

作為中國環境史研究的精彩之作，本書可以進一步加強與其他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的對話。就研究對象而言，中國學者對黃泛區，甚至同樣以扶溝和西華縣為個案的研究著作並不少^⑦，穆氏雖然在書目中有所提及，但沒有對現有中文研究成果做出比較有系統的總結。就黃河改道而言，河南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安徽、江蘇都同樣深受黃河水患困擾，但為甚麼沒有發生如河南大饑荒這樣大規模的災難^⑧？作者並未就此展開討論。

本書注重研究經濟，在社會、文化方面的探討略有不足。譬如，張喜順的研究指出黃泛區難民可以進一步細分。在1938年前，黃泛區多是離土不離鄉的主動的環境難民，1938年後成為離土又離鄉的被動的戰爭難民。在1939至1949年間隨着戰爭膠着，黃泛區農民在被動的戰爭難民和主動的環境難民間交錯流動，心態也有所差異。此外，戰亂和災荒除了改變黃泛區居民的經濟情況，也深刻影響着他們的文化認同、宗族觀念、禮俗思想等^⑨。這些方面的探索可以極大地

豐富我們對環境、戰爭和人類社會這些中心話題的認識。

本書側重實例，較少涉及理論探討和比較研究。中國環境史研究重要的理論家王利華引入人類生態系統作為環境史的核心概念，強調「生命中心論」、「生命共同體論」、「物質能量基礎論」和「因應—協同論」^⑩。這些理論與本書的視角和人文關懷頗有相合之處，可惜穆氏沒有在理論上加以應和。更廣泛地說，河南的案例與二戰中英國空軍轟炸德國埃德湖大壩 (Edersee Dam) 導致魯爾河谷 (Ruhr Valley) 洪水、德國水淹荷蘭海爾德蘭谷 (Gelderse Valley) 以防盟軍登陸、日軍佔領湄公河三角洲等，有沒有可資參照或比較的意義？而從歷史的角度，中國歷朝歷代治理黃河都鮮有完全以人為本，多是犧牲局部，裨益中央^⑪，這也與穆氏描述戰爭中的黃河治理理念一脈相承，那麼在河南大饑荒這個悲劇中，中國的傳統因素又有沒有或如何起作用？如果作者能夠橫向和縱向地對河南的事例加以分析，則更能提高本書的學術價值。

本書是研究中國環境史、二戰社會史、黃泛區歷史的精彩之作。穆氏強調的戰爭、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之間如能量流動般此消彼長又微妙平衡的關係，對於現實亦有相當警示作用。總括而言，這是一本值得仔細閱讀的好書。

註釋

① 劉本森：〈近十年來國外中國抗日戰爭史英文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期，頁109-18。

② Cormac Ó Gráda, *Famine: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馬立博 (Robert B. Marks) 著，關永強、高麗潔譯：《中國環境史：從史前到現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346-47。

④ 叢書中不少調研報告專述黃河改道造成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如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省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

⑤ 包茂紅：〈從第一屆世界環境史大會看國際環境史研究的新動向〉，載王利華主編：《中國環境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3)，頁222-27。

⑥ 實例參見包茂紅：《環境史學的起源和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221。

⑦ 如張喜順：〈1938-1952年間黃泛區的農村經濟演變趨勢——以扶溝、西華縣為個案研究〉，《許昌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頁110-13；蘇全有、張喜順：〈黃泛區農民思想觀念的近代嬗變——以1938-1952年間的扶溝、西華縣鄉村為中心〉，《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頁8-12；以及夏明方、渠長根、李艷紅等學者的研究。

⑧ 張喜順：〈比較中審視：豫皖蘇黃泛區問題研究現狀與展望〉，《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頁115-20。

⑨ 張喜順：〈持續與變遷：1938-1952年的黃泛區社會〉(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⑩ 王利華：〈淺談中國環境史學建構〉，《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頁10。

⑪ 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在河南大饑荒這個悲劇中，中國的傳統因素有沒有或如何起作用？如果作者能夠橫向和縱向地對河南的事例加以分析，則更能提高本書的學術價值。

侯曉佳 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